

WENYILUNCONG

文艺论丛



文艺
论丛

文艺论丛

(第二十二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625 插页 2 字数 333,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书号: 10078·3616 定价: 2.40元

目 录

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

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	赵 园 (1)
论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历史演变·····	蓝棣之 (34)
闻一多前期和中期美学思想的发展·····	俞兆平 (63)
闻一多的《死水》与《庄子》研究·····	江锡铨 (86)
试论何其芳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李光麾 (102)
试论蒋光慈及其《新梦》·····	陈 越 (127)
从批判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	乐 齐 (141)

——叶圣陶创作道路的发展

在探求中叩进文学的大门·····	黄候兴 (170)
------------------	-----------

——张天翼早期创作初探

论“零余者”和“多余的人”的渊源关系·····	姜 扬 (190)
论《野草》的梦境和想象形象·····	李 志 (208)
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主张及其特点·····	庄钟庆 (224)
尼采的超人学说和鲁迅的进化论·····	赵晓笛 赵晶晶 (236)
论半农杂文·····	徐瑞岳 (248)
曹禺前期剧作中的象征因素初探·····	马俊山 (269)
“因为真实，所以才有力”·····	漆 瑗 (281)

——读叶紫短篇小说集《丰收》

卓然自成一家风格·····	吴周文 (294)
——论碧野的抒情散文	
一份探索的纪录·····	江曾培 (312)
——读王蒙《漫话小说创作》	
江南三大名楼与中国古典文学·····	程裕祯 (322)
韩愈柳宗元美学思想之比较·····	郁 沅 (343)
简论苏轼的旷达胸怀和艺术风格·····	吴 深 (362)
《古今小说》的编纂方法	
——关于它的对偶结构	
·····[日]福满正博作 马振方译 曦 钟校	(372)
从《五姑娘》谈长篇叙事吴歌整理的几个问题·····	舜 娟 (386)
禹和涂山女传说初探·····	龚维英 (408)
论艺术作品的通感表现·····	於仁涵 (417)
《巴黎圣母院》美学笔记·····	卢 红 (437)
《茶馆》是悲剧还是喜剧? ·····	董康定 (450)

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 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

赵 园

一

本文论题的提出仅仅基于下述事实：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背负着宗法制的过去，同时最先迎接和创造新社会的那几代人，他们与宗法社会的联系，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化为与宗法封建性家庭的联系。大批现代知识分子正是由改造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这一种联系出发，开始了批判、以至摆脱宗法制度及其精神影响的漫长历程的。

家庭的发展，永远缩印着历史的变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民族那里，“家族史”，往往是一种袖珍版的社会史，民族史。中国式的“家”，尤其具有巨大的“历史容量”。中国现代作家如实地“把家族作为一种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曾经分任了人类经验中的一切兴衰变迁”，较之“其他制度”，更便于认识人类生活的进步过程的标本^①，作为认识宗法封建制度的一

^① 参看莫尔根《古代社会》，1957年中文版第568页。

个最便于利用的窗口。因而，

(二)他们由不同的个人经验与创作意图出发，提供了关于宗法封建性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这种家庭处于瓦解过程中的生动、丰富的图画。其中的有几部，还直接描绘了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的动向。这些作品和描写，不但给我们由文学认识中国家庭的历史变迁的丰富的可能性，而且通过其中的人物世界，以及通过渗透在作品形象中的作者的心理倾向，给我们了认识中国知识者一个重要的精神侧面、一种重要的心理体验的充分的可能性。

对于知识者，人与历史的联系，在这里变得分外明确与具体。“家”以知识者极其熟悉的形态，使历史条件、人的生活条件、人在历史变迁中所处的位置，使中国知识者的现实处境具体化了。“宗法封建制”经由“家”，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可视，可感。在面对宗法封建性家庭及其解体过程时，现代小说家的视界还更开阔些。他们不只由批判“家”批判一个制度，一种生活方式，而且还试图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思考更其广泛的“家庭问题”。他们敏捷地捕捉住了新的生活观念在这一方面的萌芽。

本文把一部分现代小说放在上述论题下来研究，如果说是由于它们间“主题”的一致性，倒不如说由于作品的客观内容间的联系和论者所取的角度。近几年来，人们关于文学创作的“主题”等问题，已经有了较为开阔的理解。他们在谈论主题的“多义性”、“多解性”，谈论即使一部“主题”较为明确的作品，也不妨有“多余的思想”，“多余的生活”。如果一部作品所提供的生活，是真正坚实丰厚的话，它理应经得住由不同角度的注视。

高尔基曾经有过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解。在他看来，“俄国文学大部分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它们可以被视为俄国知

识分子历史的“一套插图”^①。我们何以不可由这个角度研究全部中国文学，把其“大部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这种研究必将在丰富对文学史的认识的同时，丰富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特质、历史道路的认识。文学史作为人的精神创造物，本来就应当经受由创造者的精神历程方面着眼的考察。

因而，关于本文所涉及的作品，较之有关“家庭社会学”方面，我的兴趣更在于认识现代知识者，认识他们在生活的重大变动中的心理动向，他们对于宗法制的批判在对于封建家庭的批判中深入的过程，以及他们在这种批判中“自我认识”提高的过程。对于我的目的，有关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和渗透作品的作者作为知识者的主观倾向，几乎是同样重要的。并不是任何其他对象，都能使现代作家象面对宗法封建性家庭这一对象时那样，注入如此深刻的主观内容。当我在接触本文所提到的一些作品时，的确常常真切地感触到作者心理、情绪的微小颤动。正是这种情况使我相信，我可以通过我所搜集的作品，探入到现代知识者一个特别敏感的心理侧面，捕捉到他们血脉的一些轻微的搏动。

还应当说明的是，倘若有可能，现代文学中所有描写过宗法封建性家庭，以至表现“家庭问题”的作品，都应当作为本文的对象，而不论提供图画的作者，“目的性”有怎样的差异。但事实是，我仍然只能面对其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它们有的是因为本身引人注目，有的不过凑巧被我抓住了。因而这个题目仅仅在材料方面，也还有可供发掘的广阔余地呢。

二

在开始进入论题之前，我们不妨清理一下搜集到的作品，找

①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108、212页。

出与本文意图有关的发展线索。这种清理也许不致使你感到乏味。你将有机会窥见中国作家对于宗法封建性家庭的认识，随社会思想、现实政治的推进而深化的过程。两个过程——题材史与现代思想史——之间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你在现代作家不同时期的有关描写间，可以隐约看出某种分界，其中有人认识递进的印迹。

“五四”时期(尤其新文化运动之初)，思想革命以批判宗法封建的家庭制度为一重要方面，然而“五四”文学却并未提供“封建家庭”的较为完整的形象。虽然一开始就由鲁迅的笔揭露了维系这种家庭的礼教的“吃人”性质，但“五四”小说表现存在于家庭中的专制主义，更多地是联系于爱情主题、作为爱情故事的背景来处理的。这一部分“五四”小说往往由人物(有时就是作者本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忽略对于环境(包括家庭环境)的客观描写。这种情况与“五四”初期启蒙思想的特点也不无关系。

“五四”启蒙思想家批判家庭专制，通常以旧伦理为主要目标。这是知识者自身的解放要求在这一批判中的表现。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曾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次年，名噪一时的吴虞，发表了他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②。在这篇文章里，吴虞固然指出了家族制度为专制政治之柱石这一重要事实，然而究其文意，仍然是在伦理方面立论的。吴虞由封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看“家族制度”与“专制政治”的联系，断言“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这不免改动了事物之间的实际秩序。封建伦理与封建政治，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固然有其相互作用，但归根结底是被同

①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②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一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同一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吴文所谓“穹窿”与“主石”，未免比拟不伦。“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关于家庭专制的批判，其理论弱点显然在于，批判者忽略了对对象的物质方面，——封建专制主义（包括家庭专制）的社会经济基础。这种批判带有经验主义色彩，不是对于封建制度、尤其中国形态的封建制度全面考察的结果。“五四”文学反映着初期启蒙运动的特点，在其内容的这一方面，又不免因普遍的主观性而缩小了“感觉的范围”。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正是在“家”与知识者个人的这一较为单纯的关系中，知识者抓住了封建宗法制的专制主义的本质特征。他们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于人的正当权利的蔑视与践踏。一时期的大量作品，都是叛逆者、“家庭叛徒”的歌。尽管“家”的形象往往象是被人物或者作者的个人形象遮蔽了，但透过“个人”，正有“家”的形象在，即使不完整也不清晰。

对于本题有意义的，还有为有关作品记录着的现代生活的如下变动：“大家庭”解体过程中的“小家庭”——当然象实际生活中那样，还只限于知识分子“小家庭”——的纷纷建立，以及这样的现代型的小家庭，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的命运。就中以《伤逝》（鲁迅）最称深刻。

同一时期，也有较为集中地以旧式人物、旧式家庭关系为描写对象，并由此造成一种特色的作家，比如凌叔华。这位女作家以《有福气的人》、《中秋晚》等一系列短篇，写旧式家庭的老太太、太太、小姐各色人等，旧家庭生活的不同侧面，从而显示出其与同时代另外一些新文学者不同的那一份人生经验。《有福气的人》一篇，还触到了旧家庭最为丑恶的方面：由财产贪欲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虚伪性。凌叔华的批判是温和的，并没有鲜明地反映出“五四”觉醒的知识者的思想特点。但她所描写的旧式家庭的内部黑暗，究竟是为除鲁迅外的那一代小说家所普遍忽略

的。

到三、四十年代，关于“家”以及知识者与“家”的关系，较为单一的角度，被空前多样的观察、意图代替了。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规模巨大的“家族史”。这证明了现代作家由于经验与认识的积累，已经有可能提供宗法封建性家庭的较为完整的形象，有可能把对象作为整体来把握。“家族史”的小说框架，尽管不是现代文学的“发现”，但“家族史”在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史上，出现得如此集中，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无论《激流》还是《前夕》、《财主底儿女们》，都无从媲美于《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名著，然而几代作家共同创造的那种“宏伟性”，使得他们笔下的“家族史”，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不容轻视。

与此相联系的是，到这一时期，作为封建家族制度基石的封建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引起了更多小说家的注重。这一点也许仅仅对于说明现代知识者关于“家”的认识推进才有意义。因为由财产关系发掘宗法制家庭的历史本质，古典作家即使不那么自觉，他们也仍然这样作了。不能一般地把“由经济的方面”描写，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但对于现代文学的上述发展，仍然可以联系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传播来考察。事实是，新文学在这一时期，普遍表现出重视经济关系、着重由私有制以及植基其上的阶级对立观察社会问题的趋向，——不仅对于家族问题。也不仅是左翼文学。这是社会思想的发展直接、间接影响现代文学总体面貌的例子。

李大钊一九一九年说：“中国现代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① 这是典型的“五四”式的见解。直到这一时期，文学

① 李大钊：《万恶之原》，1919年7月18日《每周评论》第30号。

才力图由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 穷究家族制度罪恶之所在、之所由。现代文学中写封建家族最负盛名的作品, 巴金的《激流》, 正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作者以一般的“五四”小说家所不能想见的气魄, 铺展了“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①, 以几个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心, 表现了旧家庭错综复杂的内部关系, ——俨然一个形态完备、具体而微的封建王国。同一时期, 张天翼的《在城市里》, 老舍的《牛天赐传》等作品, 揭露了旧家庭财产关系的腐败与丑恶。到四十年代,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 张爱玲的《金锁记》等, 关于封建家族内部的财产争夺, 有更惊心动魄的描绘。同样引人注意的是, 《激流》、《财主底儿女们》等作品, 在“家”的全景描绘中, 始终让知识者处在画面的突出位置, 把表现家庭制度解体过程中知识者的精神变迁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即使不凭借这些知识者形象, 而仅由作者注入笔端的情绪, 你也分明感到了知识者与“家”的复杂精神联系, 他们既愤怒又不无“留恋”^②的矛盾心理, 中国知识者对生活的批判态度和他们自身精神的脆弱方面。

抗日战争以其强力影响着中国家庭的命运, 加速着封建家庭解体的过程, 也影响着现代作家对于“家庭问题”的思考。《前夕》中那个旧式家庭人与人关系的变动, 其直接动力正是来自民族解放战争。不约而同地, 老舍也描写了战争作为“直接政治”对于一个中产市民家庭的冲击。历史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 使中国作家集中地感受“政治”对于家庭制度的改造作用。现代

① 巴金:《关于〈家〉》(十版代序, ——给我的一个表哥, 1937年2月), 收入《巴金文集》第4卷。

② 巴金在《关于〈家〉》(见前注)中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不能说没有一点留恋。也就是这留恋伴着那更大的愤怒, 才鼓舞起我来写一部旧家庭的历史。”

作家捕捉住了这一时机。民族解放战争推动了整个民族的进一步觉醒。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反映着知识者层的新的进步，联系于又区别于“五四”时期，现代小说在新的基础上思考着知识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你可以注意到，《四世同堂》（老舍）、《引力》（李广田）所关心的，已不限于（或曰“主要不是”）旧家庭的命运，而是更为一般的家庭改造问题。因为那已经逼近了一个新社会出世的前夜。上述作品对于生活的描绘中，星光一样闪烁着理想主义。作者们的眼光更明确地向着未来：怎样的一种“关系”对于知识者个人与国家、社会才是更合理的？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才更有利于知识者的健全发展？……至少这种兴趣已隐秘地透入了构思过程，影响到小说家的思路以至作品的色调。《引力》、《四世同堂》、《前夕》等作品中，知识者关于家庭义务与社会义务、国民责任的沉思，关于个人对于历史的责任的沉思，都传达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突破宗法制文化传统而在形成中的信息。

我们不过草草地爬梳了一下有关作品，较为具体的分析还留待下文。即使“草草爬梳”，就已经使人看到，现代文学中的这类题材对于映照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历程，是一个怎样敏感的区域。现代作家把离他们自己最近的那一部分人生经验给了文学。我们正须由这一方面把握他们的有关作品，——既把它们看作客观历史过程的文学反映，又把它们作为活的心灵的创造物，由此寻找客观性与主观性在具体作品中的联系与联系方式，辨识其中历史的轨迹和人的认识发展的轨迹。

三

我将从四个方面，研究现代小说中“家”的形象，和印现其中

的现代知识者的精神特征。关于“家”的形象，我把重心放在有关描写的“现代性”上，即，说明这些小说家提供了什么异于前人的东西，表现了怎样的、以及怎样表现了他们的现代意识。

（一）被宗法封建制腐蚀的一代

——现代知识者对自身道路的思考与肯定

宗法封建性家庭的解体过程，在中国延续得这样久长，其间充满了如此尖锐或钝重的痛苦，现代作家不过幸运地得以看到这个长过程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而已。他们写食人者、食人家族，写王熙凤式的家庭暴君，写封建家庭内部集中在“支配权”、“继承权”方面的财产争夺，《牛天赐传》、《财主底儿女们》、《金锁记》一类作品，对此还描写得那样出色^①。

但那毕竟已经不是最能打动他们的东西。几部写“家”的规模最大的作品，刻划最力的，不是老的家族统治者的形象，而是他们的后代（你不妨想一下《激流》、《前夕》、《财主底儿女们》）。这不是偶然的。宗法封建性家庭解体过程中，最能激动现代作家的悲剧，也许就是“无辜者”被一个垂死的制度吞噬的悲剧吧。只有上述悲剧现实，才足以引起尖锐的痛感。

巴金反复述说着的，是这样的生活印象：这样的“家”，“甚至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食物’：牺牲品”^②。这里有他对于特定生活的悲剧性的发现，他作为现代作家最深刻的痛苦所在。

① 由对封建性财产关系的批判和人性的掘发，现代小说提供了步入末路的宗法制旧家庭最“强有力”的主子形象。这批形象，体现着现代作家对于“封建主义”的直接否定，与古典小说中血缘相近的人物一起，构成庞大的形象谱系。比如曹七巧（张爱玲：《金锁记》）、金素痕（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等。这些小说和人物形象使你看到，当一种生活方式濒临灭亡时，这种生活方式所赖以维持的财产关系，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成为怎样的一种破坏力量。现代作家抓住了生活的这种讽刺性，在描写中注入了烈火一般的憎恨。

② 《关于〈家〉》。

在《激流》中，高觉新的形象，比之一切高老太爷、克安、克定们，都饱满得多也丰富得多。作者把他个人对于“家”的没落的悲剧感受，首先集中在这个人物那里了。“善良天性的必然毁灭”，——这也许是悲剧的“永恒主题”。现代作家“碰巧”遇到了类似的悲剧现实，并赋予那个古老的悲剧主题以鲜明的时代色彩。

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善良天性的必然毁灭”的悲剧，在巴金的《憩园》中被继续发掘着。《激流》里关于克安、克定性格的悲剧性的思考，至此才酝酿成熟了更完整、更富于表现力的情节。宗法封建的家庭制度，造成精明狠辣的主子和吃祖业的不肖子弟，——两者都是宗法制财产关系的产物。并非到了现代，才有所谓“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但却是到了现代，这样的一种人及其人生，才同时显示出强烈的讽刺性与悲剧性。因为那一种人生现象，只是在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眼里，才显得可笑可悲、不合理，因为它与现代生活、与现代人的生存意识格格不入。

我们先来鉴赏一下张天翼关于破落世家子弟的描写。

他仍旧吃得很多，用他全力使动着筷子——仿佛这两根银棒很有些斤两。他把一块葱油烧饼整个塞到了嘴里，又夹起油滴滴的肉包子来。他脸色很认真地嚼着，把一双有点红丝的眼睛盯着那盘盐水猪肝，腮巴肉扯动得很起劲。看来他简直是在尽什么神圣的义务：他生到世界上来就只为的这个。

——《在城市里》

这儿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经济制度造成的畸形人、寄生者，现代社会机体上的赘瘤。

然而类似生活现象在《憩园》作者的笔下，却产生了不同的审美效果。你能明确无误地判断张天翼的讽刺意图，和他的人物的否定性质，但对“憩园”旧主人，你却很难简单地把他归之为“肯定人物”或“否定人物”。现成的范畴不尽适用了。就人物的社会本质而言，这个形象当然包含着“否定性”；但作为审美现象，问题却要复杂得多。你的审美经验告诉你，在描写这个人物时，作者的讽刺倾向被悲悯倾向压倒、盖过了。这儿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心理现象。现代作家决不会向任何一个曹七巧那样的封建主子滥施温情，他们却不能不惋惜如杨三爷（《憩园》）这样一种人的沉沦，——因为这种人的善良本性，因为他们的优异秉赋，因为他们毕竟是供奉宗法社会祭坛的牺牲。

由同样的环境走出，现代作家深知造成这种畸形人生的家庭罪恶；也正因“由同样的环境走出”，他们能敏锐地识辨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是“人生态度”！他们由这类人物身上看到的，已经不是宗法封建性家庭的一般罪恶，——那些罪恶，传统文学的揭露，已经足够有力的了。他们发现的，正是一种腐败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生态度的病态、畸形。这种发现，属于现代知识者在两个历史时代之交，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的一部分。他们面对被宗法制腐蚀的那一代人，思考自身的道路。用否定来肯定，以反题引出正题。对高觉新形象的“否定”中，显然包含着对另一种人、另一种人生的呼唤，——那是彻底摆脱了宗法制，彻底斩断了与宗法制的精神联系的人。对“憩园”旧主人的否定，同样肯定着“五四”以后的一代新人和新的价值标准、生活原则。这种“原则”，首先是“自立”。人对于自己的尽可能的占有。这正是“五四”时期最激动青年的思想之一：摆脱对于宗法制财产关系的依赖，象娜拉那样、象子君那样“走出去”。

“五四”以后的觉醒的人们，在被宗法制旧式家庭吞噬的那

一代身上，寻求对于自身、自身道路的肯定，正是这种思考使《激流》也使《憩园》深沉，复杂化了作品的审美特征。精神上的自我优越感，现代人对于自己人生选择的自信，使他们能够“悲悯”。巴金这样谈到过自己写作中篇小说《冬》和《憩园》的意图：“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个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家’这个小圈子只能摧毁年轻心灵的发育成长，倘使不同时让他们睁起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这也正是这类小说的警策所在。

这一文学主题的价值，不但被现代文学，也被当代文学证明着。由四十年代曹禺写《北京人》，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老舍写《茶馆》、《正红旗下》（尤其《正红旗下》），直到八十年代邓友梅写《那五》、《烟壶》，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反复而愈益深入地向类似人生现象发掘，并因时代环境、作家艺术个性的不同，不断创造着新的审美价值。仅仅同一主题被反复发掘这一事实，就不但证明主题的“现代性”，而且证明现代作家（还应当包括当代作家）趣味和人生观察的“现代性”的了。

（二）深刻变动中的宗法封建性家庭关系

——现代知识者的生活信念和对历史的乐观

《四世同堂》第二卷《偷生》，有一篇英国人富善关于中国式家庭结构的议论。在这个洋人看来，小羊圈祁家“这样的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文化是有许多层次的，象一块千层糕。”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们，“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揉到了一块，象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

这种观察结果，对于宗法封建家庭的昨天，也许是真实的。到现代作家操笔写作的这三十年，那种“和谐”，早已被历史无情